

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與“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楊允中*

一、前言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一篇十分重要而及時的講話，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加強和改善黨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應該說，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與確保“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亦構成正相關。講話雖未直接提及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可分割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及“一國兩制”研究，但其基本原則與精神，毫無疑問，對新興特別行政區發展及學術理論繁榮同樣具有直接而深遠的指導作用，值得認真真學好用好貫徹好。

二、近距離接觸、提升基本認知十分必要

(一) 哲學社會科學很有用

“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¹ 哲學社會科學亦即西方通常講的人文社會科學(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其性質與存在價值十分重要而不可或缺，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用“國家的大腦”，“知識與智慧儲存、傳遞、集成、整合的

大本營”來加以比喻。歷史充分證明，“人類社會每一次重大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重大發展，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²

作為探索、研究社會發展規律的活動領域，哲學社會科學特別是哲學似乎給人留下一種神秘莫測的表徵。事實上，追求永無止境的探索難免令人感到高而難攀，但在尊重知識、尊重科學時代增加一點對哲學社會科學基本認知，理應成為廣大居民文化自覺的有機成分。實踐證明，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既是綜合國力的反映，也是公民文明素質的體現。因而，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直接構成國家綜合競爭力，中國人民在逐步向更高水平的富裕靠近的同時，還應不失時機地向更高水平的文明看齊；中國的強大不僅要有肌體的發達，還要靠大腦的發達。

發展着的實踐需要發展着的理論指導，正因為如此，“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用發展着的理論指導發展着的實踐。在這個過程中，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³

哲學社會科學與民族文化自信具有直接關聯，前者的普及必然推動民族綜合素質提升，後者的強化則顯然會促進國家整體學術理論的繁榮。“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故此，“我們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不斷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⁴

* 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顧問、教授

(二)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國際影響力不低

中國是五千年傳承不曾中斷的世界文明古國，古代文明和歷代改革求變的豐盛積累至今依然是中外學者發掘、借鑒、再植、受益的源泉。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產生了儒、釋、道、墨、名、法、陰陽、農、雜、兵等多家多派學說體系，湧現了老子、孔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孫子等響譽國際的學術大師。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着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積累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2016年7月14日中國科學院舉行新聞發佈會，正式宣佈中國古代重大科技成果累計共88項。⁵這項宣佈很可能顛覆古代中國給世界貢獻的科技發明只有“四大發明”的傳統認識。其實，報告所列88項古代重大科技成果中，像干支、二十四節氣、經脈學說、中國珠算、古代法醫學、《本草綱目》分類體系、針灸、多熟種植、溫室種植、繅絲、茶葉加工、瓷器生產、萬里長城、都江堰、靈渠、大運河等代表性科技成果無一不體現哲學社會科學範疇的唯物辯證法思維，亦可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東方智慧結晶。

在當代，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路徑最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隨即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儘管一度為探索發展道路付出過沉重代價。以改革開放為標誌的新長征，三十多年來成就了人類文明史上一場經典之作。它極大激發廣大群眾的創造性，極大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增強社會發展活力，令佔人類1/5的中國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顯著提高。十分令人振奮的是，在過去30年間中國已有6.8億人告別了貧窮，佔同期全球脫貧人口80%以上，同時也標誌性地“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趕上了時代，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⁶如果同500年前那場影響到近現代全球發展

進程的歐洲文藝復興思想解放運動相比，當代中國改革開放被認定是全面改寫東方以至全球歷史進程的一場偉大而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可以成立的。

(三) 未來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中國要走好自己

早在1989年鄧小平即已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⁷在人類文明進入20、21世紀之交的全新時空，“面對新的時代特點和實踐要求，馬克思主義也面臨着進一步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⁸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歷着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着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⁹

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既是普通人民大眾一分子，要時時刻刻受生存環境、生活條件約束，同時又是人民大眾中的特殊一類，其比較發達的大腦要適度用一用，用對方向，要力求勝任社會要求和時代挑戰。他們不僅要有相對豐富的知識、學養積累，更要有堅韌不拔、持之以恆的思維定力和實事求是、義無反顧的探索精神。他們要走的路，可能順風順水，也可能逆境重重；可能風光無限，也可能備受指責。做一個忠於職守、有作為有膽識的學者也並非易事。

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隊伍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隨着綜合國力增強他們研究成果一再獲得突破，研究環境越發寬鬆自立，兩年前國家決定建立數以百計的高端智庫，學有所長的學者可獲得十分可觀的經費支持，說中國學術理論界正進入新中國67年來最好發展階段，亦絕不為過。

與此同時，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戰略還不十分明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一方面，哲學社會科學還處於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的狀況，另一方面，簡單片面、急功近利、講套話說空話、粗製濫造等不良不正學風，學術不端甚至學術腐敗現象，均有

待清除，同實現“兩個一百年”的中國夢，同擁有悠久歷史文明古國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還十分不相稱。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實踐發展永無止境，我們認識真理進行理論創新就永無止境。”¹⁰ 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不足百年，發育還處在初級階段，在加速發展進程中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難以避免，為了求其解決就越需要我們在實踐上大膽探索、在理論上不斷突破。走好自己的路，一要尊重客觀、尊重現實，堅持實事求是、問題導向，二要堅持永無止境的探索，堅持創新導向，“我們要以更加寬濶的眼界審視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發展的現實基礎和實踐需要，堅持問題導向，堅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聆聽時代聲音，更加深入地推動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開辟 21 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¹¹

（四）“一國兩制”理論創新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大奇葩

在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一國兩制”這一既定基本國策無疑是最令人感興趣的理論課題和實踐課題。表面上看，“一國兩制”承諾保留原有資本主義 50 年不變，但實質上是基於民族利益、國家利益最大化，“一國兩制”最終目的同樣是實現“兩個一百年”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因而同國家主體部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恰恰是殊途同歸、異曲同工。

伴隨改革開放新政出現並迅速成熟的“一國兩制”理論以及可界定為跨學科或多學科的“一國兩制”學(多贏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憲政的一次劃時代創新成果。根據初步分析，它不僅構成憲法學、政治學的一個核心內涵，而且也是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國際關係學、心理學、美學等基礎學科有待重點突破的熱門課題；不僅是現有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學術界以至全國學術理論界方興未艾的一大重點學術活動領域，而且也已成為逐步吸引全球相關學者重點投入、重點突破的一個前沿

研究領域；不僅有待哲學社會科學界全力投入、百花齊放，盡快實現這項國產化、專利化嶄新理論體系的正當定位，而且也應進一步在明確學科定位後盡快構建出中國特色“一國兩制”人才培育體系。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已有近 20 年歷史，兩部基本法正式頒佈已分別有 26、23 年，在港澳兩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區裏所以一再出現爭拗甚至抗爭，某種情況下“港獨”或“準港獨”已逐漸公開化、表面化，其性質顯然屬於新與舊兩種政權性質之爭，但同時亦與對基本法理解不到位包括“一國兩制”研究不到位有關。事實上，一個特區穩定度和諧度不低，而另一個似乎蹣跚前行；一個應被認定為逐步進入實踐成熟期，而另一個仍在艱難爬坡。進一步提升規律性認知和理論與制度自信，對兩地都有必要。

怎麼對當前兩個特別行政區的“一國兩制”實踐作出客觀評估，可能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即學術理論界的一個十分突出的現實課題。宏觀上的肯定與微觀上的重視，顯然都是不可忽視、不可低估的。照理講，儘管“一國兩制”是百分之百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但由於中國是具悠久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有日新月異、飛速前進的強大祖國作後盾，“一國兩制”的必然性與可行性經長達三十年推介宣傳，其科學性、優越性已為特區廣大居民所認同，且已為其帶來回歸前無可比擬的實際好處，故特別行政區及其制度理應逐步進入規範化常態化甚至成熟化的態勢。

三、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合理定位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大現實命題

（一）進一步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意識至關重要

“我們要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勇於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讓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讓發展更有質量，讓治理更有水平，該人民更有獲得感。”¹²

憲法作為國家根本法，是法制核心與權力淵源，是國體、政體的確定依據，是立國建國、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載體。憲法意識是國家意識的首要內涵，故它應在公民頭腦中佔據一個相對顯著空間，尊重憲法、維護憲法也應是全國公民包括特別行政區中國公民的第一法定義務。

在特別行政區部分居民其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所以較為淡薄，與他們原有生活環境不無淵源，強調憲法、憲制、憲政的核心意義與價值就在於：一是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二是履行公民在國家面前的基本義務。而上述要求的具體化正是集中在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正確理解與正確實施上。

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設立基本國策的認定

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項規範的歷史價值和意義就在於以憲制規範形式正式認定單一制社會主義國家在必要時可以在歷史背景特殊的局部地區設立實行非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別行政區，這是前人所不敢想象、不可思議的制度創新，也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破天荒，前所未有。這也清晰地標誌着“一國兩制”作為一項嶄新基本國策進入有法理依據的認知成熟化、實踐程序化階段。

2. 基本法的母體是國家憲法

國家現有兩部基本法，分別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基本法是國家的基本法律，也可以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的具體化，是“一國兩制”理論的具體化和“一國兩制”制度即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具體化。在當代，講憲法，顯然不能忽略其第31條關於設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授權性規範；講基本法，同樣不能忽略其法理淵源，要對憲法的權威性、上位性保持應有的尊重、敬畏。事實上，現有的兩部基本法，就其性質與功能不僅僅中國法制史上不存先例，而且在國際法制上也屬前所未有。故此，在愛國愛澳群體面前，特區就是國家不可分割組成部分，把特區事情辦好就是最大愛國

行動。當然，在基本認知上還要不斷調整與鞏固：一方面，要理解、接受憲法是基本法的母法，是基本法的上位法，也是制定基本法的授權法和基本法成功實施的保障法；另一方面，正確認定基本法的法律定位和立法原意同樣重要，全面落實“一國兩制”基本國策的基本法，是典型的獨特的中國憲政創新，它是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中位階最高的根本大法，它全面開創當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社會制度求同存異、對立統一新時代，它所體現的特別行政區制度不容扭曲、不容動搖。

3. 憲制意識的養成

憲制意識可以理解成公民對自己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正確認知。作為剛剛經歷回歸這樣重大歷史性變革的特別行政區居民，根在大陸、利在大陸、情在大陸、未來在大陸，這是無法改變的現實，因而及時而有效地提升基本的憲制意識尤顯重要與必要。這裏講的憲制意識似應包括：

①對憲法確定的國體、政體，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特別行政區是社會主義中國中央政府領導下的地方行政區域的認同。②對中央全面管治權，即國家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理所當然對其擁有最高管治權，而高度自治權不同於完全自治且源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授予的認同。③對領土主權與國家核心利益，即建立正確的國家與特區關係，國家與特區、全國人民與特區居民是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的認同。④對國旗、國徽、國歌等國家標識的認同。⑤對民族傳統文化與通用語文即對特區居民文化基因的根與祖而且是有待充分保護、完善、開發、利用的智慧寶藏以及聯合國正式語種之一並已是為全球使用頻率最高之一的國家通用語文即普通話的認同。⑥對二元國情，即一方面中國已成當今全球發展最大火車頭、民族偉大復興已初見成效、未來可能也必然對人類文明提升作出更大貢獻，另一方面，國家發展依然在產業行業之間、地區之間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嚴峻現實的認同。¹³

特別行政區社會現實再次證明這樣的判斷：“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¹⁴故此，“要堅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高度重視道德

對公民行為的規範作用，引導公民既依法維護合法權益，又自覺履行法定義務，做到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相一致。”¹⁵

(二) 特別行政區制度即“一國兩制”政治制度

2011年7月1日，胡錦濤在慶祝中共成立九十週年大會的講話中，在談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時，明確提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構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體制度，符合我國國情，順應歷史潮流”。¹⁶

這清楚地表明，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可以用“1+3+等”政治制度來表述，核心的核心是作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它是憲法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政體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另外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亦分別承載着不同領域政治導向和制度保障的時代功能。學者曾十分關注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後面的“等”字，認為加了個“等”字就表明屬非窮極用法，即根據形勢演進和認知體系的深化還存在調整、補充的可能。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李林所長認為，“應當在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基礎上，增列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中國的第五項基本政治制度。”¹⁷ 他的理據有四：①“一國兩制”是執政黨和國家長期奉行的基本方針，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實施“一國兩制”方針的基本制度形式，將長期存在和發展；②“一項政治制度能否成為基本政治制度，關鍵要看其政治重要性”；③“一項政治制度能否成為基本政治制度，要看其憲法地位如何”；④“一項政治制度能否成為基本政治制度，要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否為其制度了配套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否具有基本法律制度。”¹⁸

一份不同尋常、意義深遠的建議書，在2011年12月17日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與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學術研討會”上，受到與會者高度關注。會後，由楊允中、黃來紀、尤俊意、吳天昊等代表與會大多數專家學者正式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吳邦國委員長提交了將“特別行政區制度確定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議書。該建議書提出的理據是：①建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②經過港澳兩部基本法的制定，“一國兩制”與特別行政區制度已具有完整的法制框架與保障體系；③經過香港特別行政區15年實踐與澳門特別行政區12年實踐驗證，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生命力、優越性得到全面展示；④“一國兩制”事業既是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特區政府和居民的莊嚴事業，也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事業；⑤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直接同祖國和平統一和民族偉大復興息息相關，是有待多代人為之奮鬥的長遠目標；⑥特別行政區制度絕不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也不應被視為消極的負面現象。”¹⁹ 建議書認為此舉的好處是：①標誌着中國特色憲政創新進入成熟階段；②有助於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③有助於港澳居民愛國愛港愛澳意識的增強和自主建港建澳意識的提升；④有助於台灣同胞增進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⑤有助於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良性互動和全國人民與特別行政區居民間雙方關係的持久改善；⑥有助於在國際社會樹立特別行政區的正面形象。”²⁰

適時提升特別行政區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地位，將其上升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展完善的需要，也是特別行政區制度自身發展完善和不斷創新的需要，更是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需要。不失時機地深化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理論研究，不斷豐富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理論體系，是擺在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全國學術界面前的一項挑戰和考驗。²¹

四、澳門經驗彌足珍貴

(一) 一步好棋

“實踐證明，只要堅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堅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堅持包容共濟、促進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廣泛團結，‘一國兩制’實踐就能沿着正確方向走穩、走實、走遠，澳門就能擁有更加美好的明天。”²²

是特殊的中國國情、特殊的歷史背景、特殊的社會現實，造就了今天的澳門；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為首的國家領導人不失時機地推出“一國兩制”基本國策，令澳門有份成為“一國兩制”示範區並站在時代前沿探討有關發展規律的認知。一是特殊歷史、特定時代需要及時總結“一國兩制”實踐規律，二是國家和平統一大局需要及早展示“一國兩制”成功經驗，三是中國第一個特別行政區提供的經驗尚欠完整與深刻，四是澳門特區政府與居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與認同、貫徹與實施保持一個不低的堅定性、自覺性。此時此刻強調對澳門經驗、澳門規律、澳門模式的梳理、倡導不僅完全必要，而且也具基本條件。面對“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深水區的新時代、新常態，要走好符合歷史規律、符合自身特點的新型發展之路，必須堅持在發展目標、路徑上符合國家總方針總任務要求；作為前沿陣地，其實踐取得持續穩定發展成效；政府引導有很強決心、勇氣、魄力；民眾認知有較高共識；外界包括國人和世人有基本的理解與認同。

“澳門回歸祖國 15 年取得的成就，值得澳門同胞和全國各族人民自豪和驕傲；探索積累的寶貴經驗，值得澳門同胞和全國各族人民珍惜和銘記。”²³是“50 年不變”的第一個 1/3 實踐期的成功實踐，令澳門的地位、作用、意義、影響無可取代。重視澳門、重視澳門實踐經驗、確保澳門的實踐價值與意義受到普遍認同，着實是一步大棋、一步好棋，而這也是擺在特區政府與學術理論界面前沒有選擇餘地的實際考驗與挑戰。

(二) “兩個正確”，常態堅守不放鬆

所謂“兩個正確”係指：一是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正確理解，二是確保“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正確實施。正確實施是目標與願景，正確理解是條件與前提。“一國兩制”的正確實踐或基本法的正確實施意義重大：這是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的殷切期盼；這是驗證“一國兩制”科學性、生命力的需要；這是特區居民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的展示；這是確保特別行政區制度落實到位的前提；這是突顯小澳門大作為的歷史必然。基本法正確理解源於回歸意識的到位，源於對現代法治的崇拜，源於對中華傳統文明的堅守，源於愛國愛澳觀的拓展，源於對民族復興中國夢逐步實現的信念。

求同存異、對立統一觀是“一國兩制”理論的認識論基礎。在一種新政權、新發展模式、新社會生態全面啟動的特別行政區，公權力機關與社會各界認知體系包括核心價值觀的調整，理應被列為常態要求之一。以下重點討論一下須與不可以放鬆的九個關係。

其一，“一國兩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係。兩者形式上有異，但實質上趨同，最終目標都在於“兩個一百年”中國夢的成功實現。事實已有力地證明：只要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理解不走樣不變形，那麼，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絕不會也不應傷害國家主體部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反而直接間接地構成兩者間的優勢互補、共同受益，從而達致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之效。

其二，“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別行政區、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它們之間實質上都是整體與局部、上級與下級、統領與從屬的關係。故此，強調其中任一方時都要堅持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的基礎。歷史與現實反覆證明，國家對特區一向關愛有加、鼓勵有加、支持有加，一心指望特區成為驗證“一國兩制”的成功範例。作為特區居民，則不能誤判形勢，任意扭曲基本國策，肆意挑戰中央權威，否則，其自討沒趣、自辱人格的下場是不存疑義的。

其三，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與特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關係。無論中共十八大報告還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白皮書都已作出十分清晰的論述，兩者具高度同一性，是一個總體目標

的兩個側面，而不是互不相干或互相對立的兩回事。

其四，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關係。澳門博彩業深度調整仍在繼續，但整體經濟基調依然穩定正常，2015年雖發展指標明顯下滑，但財政結餘仍有澳門幣293億元，失業率續保1.9%低位。開源節流、量入為出、不能有絲毫放鬆，只有民生福祉穩定，精神文明的拓展方有切實基礎。

其五，歷史澳門與當代澳門的關係。歷史上，澳門曾是一個中西文化和學術交流中心，澳門因而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富礦；當代，澳門因實行“一國兩制”其地位與功能、價值與影響得到全面提升。文化與學術地位的不可取代性、獨特性，必將哺育一代又一代澳門學人開拓進取、破浪前行。

其六，理論與實踐、知與行、法制規範與公序良俗的關係。這些都是對立統一、互為促進的辯證關係。矛盾雙方既對立又統一，觀察時必須全面兼顧，抓住重點、抓住核心，對於表面化、簡單化、單一化認知行為需客觀理性地拒絕。

其七，倡導建立雙輪雙強驅動結構，即強強對應關係。所謂雙輪雙強驅動結構係指：一方面，特區政府一定要強勢，無論執政能力還是執政理念都要強；另一方面，社會也要強勢，既不缺回歸思維又具創新開拓思維。

其八，維護國權與尊重民權關係。前者對政府和社會各界都義不容辭，後者則更多強調官民關係的協調與平等、尊重與支持，對於各級當政者與民意代表當深思再深思。

其九，高發展指標與低公民素質的關係。澳門2015年首現兩位數負增長，但人均GDP仍達澳門幣574,790元，即71,984美元，分別高出香港與新加坡，且幅度頗大。但社會結構的發育程度恐仍低於香港、新加坡。對此，特區政府與各界人士都應認真評估，知恥而後勇，不宜一味滿足於表面上的指標光彩。

五、結束語

現實世界清楚不過地表明，“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於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於哲學社會

科學發展水平。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²⁴ 學習習近平重要講話，使人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我們的國家是偉大的國家，而偉大國家不能缺少令人敬佩的文化傳承；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而偉大民族不能脫離成熟理論的指引；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偉大的時代，而偉大時代不能不伴隨完整系統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我們從事的事業是偉大的事業，而偉大事業不能不導致某些常規定勢的改寫和文明進程的加速。澳門是幸運的，因為它被國家列為“一國兩制”基本國策的驗證基地；回歸之後長逾兩個8年的實踐表明，從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大方向上看，路走對了，沒有偏離；從具體成效上看，全面改寫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指標，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從外部參照值看，社會和諧穩定度絕不低於另一個特別行政區，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成為社會主流取向；從內部結構看，其成功具不可取代性，它把“一國兩制”的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值推向了不容低估、不容錯判的高度，澳門因而成為國人與世人公認的“一國兩制”驗證前沿陣地，成為一座令人心服口服的“一國兩制”陳列館。

在前行路上及時發現還缺點甚麼，及時清理制度優勢的不到位率，就成為一道不容繞過而必須跨過的門檻。因為深一層觀察，澳門的劣勢和難題依然舉處可見：舊制度累積的矛盾非一時可以全面消化；特殊歷史、社會環的制約非簡單化思維可以面對；新事物實踐中新矛盾新問題在挑戰人們的神經，也在考驗人們的智慧。認真總結好自身發展規律，堅持走好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原則的未來發展之路，確保新形勢下“一國兩制”實踐成效可見化、有感化、最大化，確保正確理解基礎上的正確實踐日趨步入成熟，這是特區政府和各界居民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不能不說壓力更大、挑戰更多，當然，機遇永遠留給對形勢有正確判斷、對未來充滿信心的人士或群體。而主動關注一下哲學社會科學並力求身體力行一些基本認知、基本規律、基本理論，無論對身居高位的領導者還是其後備團隊，無論對專業學術研究人員還是各行各業潛質優厚的精英，都是當今瞬息萬變時代發展的要求。

註釋：

- 1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5月18日，第A2版。
- 2 同上註。
- 3 同上註。
- 4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7月2日，第A2版。
- 5 《中國古代科技何止“四大發明”》，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7月15日，第A1版。
- 6 同註4。
- 7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頁。
- 8 同註4。
- 9 同註1。
- 10 同註4。
- 11 同上註。
- 12 同上註。
- 13 楊允中：《“一國兩制”與現代國家觀》，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5年第4期(總第26期)，第9、10頁。
- 14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編：《習近平論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41頁。
- 15 同上註。
- 16 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頁。
- 17 李林：《特別行政區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2年第1期(總第11期)，第16頁。
- 18 同上註。
- 19 楊允中、黃來紀、李志強主編：《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76、77頁。
- 20 同上註，第77頁。
- 21 楊允中：《關於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再認識》，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第10期，2011年，第11頁。
- 22 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載於《澳門日報》，2014年12月21日，第A1版。
- 23 同上註。
- 24 同註1。